

暗夜 灯火

——
打开历史尘封的红色记忆

樊国安◎著

《读书与出版》是在国统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份红色刊物
它成为照亮人民思想的“一盏灯火”
引导广大青年走向进步和光明的道路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暗夜灯火

——打开历史尘封的红色记忆

樊国安◎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夜灯火：打开历史尘封的红色记忆 / 樊国安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1
ISBN 978-7-201-17883-7

I. ①暗… II. ①樊… III. ①期刊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2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51929号

暗夜灯火：打开历史尘封的红色记忆

ANYE DENGHUO: DAKAI LISHI CHENFENG DE HONGSE JIY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策划编辑 韩玉霞
责任编辑 李佩俊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280千字
版次印次 2022年1月第1版 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奇人、奇事、奇书(代序)

樊国安是我当年在《新闻出版报》(现为《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的老同事。他为人热情、豪爽、仗义,是一位奇人。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英雄杜凤瑞飞行大队政治委员,是天津市首届“十佳记者”之一,担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天津记者站站长将近三十年。在报社大家都叫他“老樊”,天津文化出版界同行们都叫他“樊哥”,中宣部一位老领导则称他为“中国名记”。大家都说,有他在事情就办得红火,事业就干得兴旺。

老樊从读书中尝到了无尽的甜头,更愿以专业记者的角度和责任去唤起更多的人读书。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撰文呼唤天津开办读书节。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于1994年1月8日在《今晚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人还读书吗”的长文,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分析国人的读书现状,痛陈问题所在,呼吁“亡羊必须补牢”。在他和许多有识之士的倡议下,1996年天津首届读书节开办了。由于他对读书活动报道突出、策划积极,成为当年天津市委宣传部和读书节组委会表彰的唯一一位中央媒体记者。与此同时,他又倡议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开办读书热线,并受邀担任特约嘉宾,利用这块园地,为读书鼓与呼,为营造津城浓郁的读书风气,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他还倡导成立了由出版社、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社

会阅读推广人组成的天津市第一个全民阅读公益团体——天津市南开区公民读书促进会,身体力行地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如今,全民阅读已经蔚为大观,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看到此情此景,我想作为阅读推广人的老樊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除了写书作文,老樊还有一大爱好——收藏。因为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他很早就对中国古籍和民国以来出版的书、报、刊产生了浓厚的收藏兴趣,开始在天津古文化街、沈阳道、鼓楼,北京的潘家园,以及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淘起旧书故纸来。他说自己搞古玩收藏,主要是为发思古之幽情,给自己充充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同时给自己的业余生活添点文化的情趣。他说:“古玩收藏这个门道,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财力基础外,能否淘到货真价实的藏品,关键是要靠恒心、眼力和运气。首先是必须有恒心,搞古玩收藏不能鼠目寸光,不能急功近利。”正是靠着这份恒心和眼力,不少高质量的藏品被他收入囊中。

和其他藏家不同,老樊对中共早期出版的“红色读物”兴趣非常浓厚。大约五六年前,他在天津举行的一次古旧书籍拍卖会上,发现了一套1947年出版的《读书与出版》全年12期合订本,就毫不犹豫地举牌拍买下来。

《读书与出版》于1935年5月18日由生活书店在上海创刊,到1937年底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刊,先后由胡绳、史枚和陈原担任主编。资料显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全国创办各种报刊1628种,但是生存时间却大多不长,一半以上的报刊生存不到1年,生存期能跨越3个年头的仅占报刊数的13.2%。《读书与出版》在解放战争时期生存了29个月,是当时在“国统区”生存时间较长的“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自1946年4月复刊直至1948年9月最后一期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为止,这份“红色刊物”的编辑人和撰稿人紧紧围绕人与书、书与人以及个人与时代、时代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心灵碰撞,对那个时代作了真实而生动的记录,是引导“国

统区”的人们,特别是引导广大青年奔向进步与光明的“一盏灯”,也是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传奇。

《读书与出版》杂志是一部记录一个特殊时代读书界与出版界真实生活和基本文化走向的极其厚重的“大书”;是一部蕴藏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集体智慧的“大书”;是一部反映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时代风貌的“大书”;是一部闪烁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信仰追求的“大书”;是一部传承弘扬邹韬奋精神的“大书”,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绝唱!

翻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老樊被深深地感动着,激励着。他感到,当年办刊人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接地气”的办刊经验,对于我们办好今天的报刊、推动全民阅读、繁荣出版事业,仍然具有极为宝贵的借鉴意义。因此,何不把这些往事写下来,把这些经验总结出来呢?这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在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下子点燃了他心中不可遏制的激情。在这个瞬间,他完成了从藏书家向研究者身份的转变和飞跃。

为了研究,也为了写好《读书与出版》这份“红色刊物”的书稿,老樊收集了1935年的6期、1937年的2期,以及1946年4月复刊到1948年9月停刊的全套共29期《读书与出版》杂志。这个过程非常艰难,甚至在2020年初的疫情期间,他也没有停歇,终于从孔夫子旧书网上购买到了一套品相完好的1946年出版的共8期《读书与出版》和1948年出版的共9期《读书与出版》。至此大功告成。

找书不易,研究更难。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读书与出版》杂志的时代背景、出版历程,总结其办刊经验,为今天提供有益的借鉴,老樊夜以继日,焚膏继晷,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把这些杂志共200多万字的每一篇文章反复咀嚼、消化,同时阅读了大量参考书籍和文章,爬梳剔抉,旁征博引,淬炼打磨,总结升华,终于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研究专著。

本书主要分为引言、历史大转折、刊物小档案、青年一盏灯、书籍交流

台、阅读推广者、自学大课堂、竭诚为读者、封面和补白、特辑纪念号、精彩文章录、名家论鲁迅、科学小品文、杂志回顾录、图书馆掠影、一流办刊人、书香溢百年、附录等18个部分,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读书与出版》杂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意蕴丰厚,考据详实,观点深刻,文笔流畅,兼具历史性、思想性、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续写了《读书与出版》杂志跨越70年后的又一个传奇。

老樊这一辈子,和一个“书”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数十年在一份关注书籍的媒体当记者,采访过写书人、编书人、发书人、读书人,而自己也经历了爱书、淘书、藏书、写书的各个阶段,如同一个小小的“书虫”,徜徉于书籍的海洋。他之所以对《读书与出版》这份杂志情有独钟,是因为这是一本爱书人写的有关读书和出版故事的书。虽然它距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看见老一辈共产党人读书、评书、写书的精神气韵,感受到一个特殊时代的出版人和读书人的精神追求,从一本本“红色刊物”中,抚摸历史深深的年轮,重温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老樊的这本书不仅为出版史、读书史研究增添了一分亮眼的成果,也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献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2020年6月18日

李晓晔*于北京花园村

*现为新闻出版研究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兼基础理论研究室主任。

目录

001	引言
006	历史大转折
011	刊物小档案
021	青年一盏灯
042	书籍交流台
081	阅读推广者
107	自学大课堂
120	竭诚为读者
129	封面和补白
145	特辑纪念号
169	精彩文章录
193	名家论鲁迅
211	科学小品文
229	杂志回顾录
268	图书馆掠影
286	一流办刊人
332	书香溢百年
338	附录:《读书与出版》总目录
362	后记

引言

《读书与出版》1935年5月18日创刊于上海,1936年一度停刊,停刊期间,卷期编号空缺。1937年3月恢复出版,1937年3月16日出版的第24期为复刊号,1937年底再次停刊。1946年4月第二次复刊。

1948年2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发出查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读书与出版》的密令。1948年10月18日,“三联书店”在《大公报》刊登书店迁往香港、《读书与出版》休刊的启事。俟国民党特务发现时已经人去楼空。^①至此,到1948年(再次复刊第3年)第9期为止,《读书与出版》就这样被迫和广大读者告别了。

在决定新中国和旧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所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创办了一大批进步报刊,这批进步报刊成为讴歌光明与进步的时代号角,成为推动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的强大舆论力量,被誉为在文化战线向国民党反动派做最后决定性较量的“第二方面军”。在这批进步报刊中,《读书与出版》是中国共产党

^①范用:《一个战斗在白区的出版社——记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史料》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上海创办的一份“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理论”刊物,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勇于评论好书、推荐好书,积极倡导读书的“很有影响的刊物”。由于恰巧处于解放战争这个中国历史大转折的特殊时代,以《读书与出版》为代表的进步报刊的出版活动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特殊地位:在出版活动中形成的马列主义报刊思想理论基础,对于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读书与出版》为代表的一批进步报刊培养的编辑人员、作者队伍,成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中坚骨干力量;在出版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报刊出版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读书与出版》以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强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令国民党反动派胆战心惊、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一份“红色刊物”,以极其生动活泼的朴实文风和接近生活而成为广大读者争相订阅的“红色刊物”,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绝唱。

刊物是精美的,文章是精短的,内容是耐人寻味的,这是《读书与出版》留给读者的深刻印象。以下简单介绍几处。

《郭沫若的演说》中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在热烈的掌声中,沫若先生离开了座位,站在我们的面前了。他慢慢地取出预先写好的演说稿,开始读起来了。但立刻我们就不觉得他是在念他的稿子,只觉得他是把全部的心力,全部的人格,倾注了出来,构成他的声音和言语。渐渐地我们甚至不觉得有一个人在演说,只觉得在我们上下周围充塞着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宣说着我们人人心头的爱,我们人人心头的憎。于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发疯一样地鼓起掌来了……”^①

《夏衍的勤快》中言简意赅地写道:“多数人只知道夏衍先生是个剧作家。然而他实在不只是一个剧作家。他写报告文学,写杂文,写通讯,写小说,还写政论,写国际问题的分析,几乎什么都写。假如说,夏衍先生是

^①文萃:《郭沫若的演说》,《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7期。

文坛中最勤快的人,恐怕是无可反驳的。”^①

介绍《翦伯赞搜集史料的方法》的文章说:“有一天,遇见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谈起他的《中国史纲》……我问起他如何搜集材料的方法。伯赞先生说:‘我的方法是很笨拙的。我先从文献资料读起。譬如二十四史,我就通篇读过,任何一篇都不遗漏掉。在读时,用各种颜色笔做下记号。经济史料用红色,政治史料用蓝色,文化史料用黑色……然后再根据这些记号把史料分类抄录下来。读别的文献也是一样。’他笑了笑:‘你看我这方法是不是很笨?但我想,既要做学问就非笨拙地从头做起不可。’”^②

《一本书的诞生》提到文坛两位名人和书的轶事:“抗战期间因纸张来源缺乏,版口都特别放大,有老五号字排十七行四十字,新五号字排十九行四十字者,名为‘战时版’。其实用新五号字,印在土报纸上面,模糊不清,就菜油灯下阅读,确乎有损目力,对中年人尤不相宜。据说茅盾先生在重庆,经常须借助于放大镜。鲁迅先生生前自己设计排印的书版,不仅多留天地,且须加排‘四配四’,战前的北新版各书可以参看。可惜现在的《鲁迅全集》已非当年旧观了。”“上面所讲的,都是粗枝大叶,但我们已经应感觉到一本书的诞生,实在也是‘来处不易’!何况更处在今天内战扩大,工料高涨,交通阻塞,销路滞呆,而出版又不自由的时候。”^③

谈起当年读书人的风险,《悼失书》的作者沉痛地回忆:“时刻萦回在我脑际的,是一部分心爱的书的失去,每次想起,心中一直是酸溜溜,要难过半天。”因为“这许多书,是冒着极大的险,偷偷地藏在箱子底,从上海带回来的。那时敌人站在码头上,两只狰狞的眼,盯住着每个往来的客人,身上、衣包、箱子,都得经他细细的检查,谁也无法逃过,然而爱着这些书

①《夏衍的勤快》,《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6期。

②《翦伯赞搜集史料的方法》,《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6期。

③《一本书的诞生》,《读书与出版》1947第10期。

犹甚于自己的命,不顾一切,绞尽了脑汁,想尽了方法,终于带了回来。那时万一查出了,白晃晃的刺刀刺进胸口,向白浪滔天的大海里一推,那不是玩的事,然而当时竟没有顾虑到”^①。

在《琉璃厂,这旧文化的库房》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用北京一位古董商的口气来表达老百姓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导致民不聊生的反感情绪:“‘这年头儿,在乡下,富的人变穷,穷的人更穷,大家都活不下去。这样冷的天气,’他拉拉大褂,‘我连皮袍也换不起。人心太坏了,只有人人改心换肠,世界才有希望。’”^②

诸如以上这些生动形象地讲述出版人的辛苦支撑、写书人的艰难创作、读书人书海寻航的各种故事以及文坛名流的奇闻轶事,仅仅只是刊登在《读书与出版》数千篇长短文章中的只光片羽,精彩的文章和珍贵的史料在每一期的《读书与出版》中俯拾皆是,可谓是期期刊物“开卷有益”,篇文章都有特定价值。所以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颇有感触地说:“抗战胜利后,上海生活书店创办的《读书与出版》月刊是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我有幸保存了它的全套共二十九本,暇时翻翻,仍然感到很新鲜。”^③

的确,《读书与出版》自1946年4月5日创刊(复刊)直至1948年9月最后一期(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在长达29个月的时间内,这份“红色刊物”的编辑人和撰稿人不避政治高压,坚持刊登揭露社会黑暗,介绍进步思想、作品及人物的文章,紧紧围绕人与书、书与人、个人与时代、时代与个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心灵碰撞,各种深刻思考,各种生动故事,各种文字表述,做了200多万字生动有趣的真实记录。恰如《读书与出版》当年的主要编辑人陈原先生所说:“那时写文章是一种战斗,环境虽那么险恶,

①《悼失书》,《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9期。

②绍荃:《琉璃厂,这旧文化的库房》,《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

③姜德明:《〈读书与出版〉杂记》,《金台小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

战斗却不会停止的。”^①应当说,《读书与出版》这份“红色刊物”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中心上海的诞生和存在就是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传奇。

为了探索和解开这份“红色刊物”成为伟大时代号角的奥秘所在,为了深入挖掘和解析这份“红色刊物”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其为我们今天的传承所用,笔者埋头钻进这些“堪称珍本”的《读书与出版》杂志之中,在200多万字的文字“宝库”中钩沉寻觅、剥茧抽丝,仔细欣赏一个个特色栏目,认真品读一篇篇精彩文章,反复研究一个个历史人物,追根溯源一例例动人故事。笔者愈发深刻地感觉到,虽然这份“红色刊物”告别我们已经有70余年的岁月,但是从每期刊物封面特大字号印出的刊名“读书与出版”,到每期刊物内文的丰富文字,以及封二、封三、封四的“广告”内容,这份“红色刊物”的每一页都离不开一个“书”字。毫无疑问,《读书与出版》杂志是一部记录一个特殊时代读书界与出版界真实生活和基本文化走向的极其厚重的“大书”;是一部蕴藏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集体智慧的“大书”;是一部反映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时代风貌的“大书”;是一部闪烁着前辈写作人、读书人和出版人信仰追求的“大书”;是一部传承弘扬邹韬奋精神的“大书”;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绝唱!

同时还应该指出,《读书与出版》的编辑人李平心、艾寒松、徐伯昕、张仲实、林默涵、胡绳、史枚、陈原、陈翰伯等,大多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和“生活”系列报刊的骨干人员;《读书与出版》的撰稿人孙起孟、周建人、柳亚子、王任叔、侯外庐、戈宝权等,全是中国出版界、文化界元老级的人物,每一位人物都有一个传奇般的故事。

^①陈原:《不是杂志的杂志》,《读书》1990年第9期。

历史大转折

今后数年内，不特对中国人民至关重要，且余信对世界和平亦然。

——马歇尔^①

上面这句话是1946年4月《读书与出版》的创刊号，在显著位置刊登的是负责调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军事冲突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判断。《读书与出版》编辑人之一的胡绳先生说，当时所处的时代节点“对于中国的命运，是划时代的转折点；对于生活和工作在那个时期的每个人来说，都不能不具有分水岭的意义”^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维持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妄图利用“和谈”争取时间作好军事部署，发动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的进攻；同时混淆视听，企图争取对其有利的舆论。同年，蒋介石连续

^①马歇尔，曾任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1945年12月，作为驻华特使抵上海，负责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6年11月调处失败，返回美国。这句引语见《读书与出版》1946年第1期第3页。

^②胡绳：《胡绳文集（1935—1948）》自序，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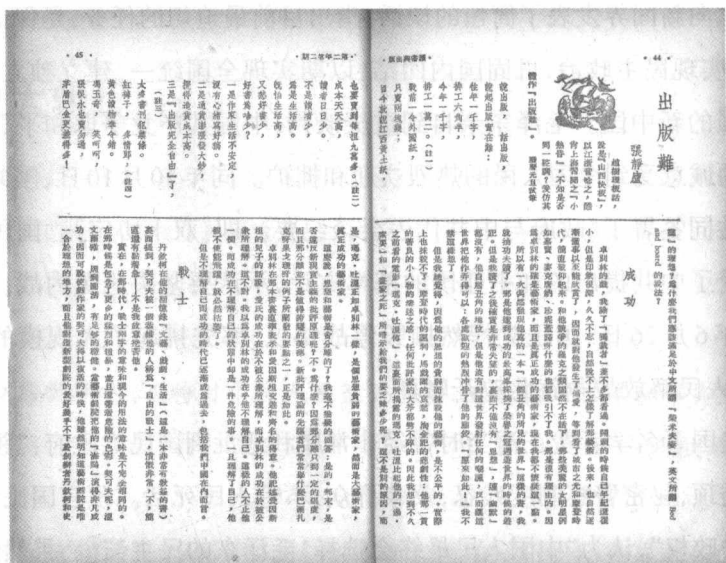
三次致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政治伎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通报了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决定。毛泽东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同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可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议,率先挑起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人民解放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当时曾经非常犀利地批判国民党政府:“领导层腐败透顶,秘密警察制度残忍,蒙蔽群众,不管人民死活。”预言国民党“必将失去政权”,认为“中国人民最终会选择‘毛泽东的民主’”^①。果然,仅仅经过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到了1948年9月,以辽沈战役胜利为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在军事战场上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当时中国的文化事业一片凋零,1945年7月7日,田汉、曾昭抡、潘光旦、尚钺、李公朴、闻一多等党内外进步文化人士,在昆明举行的文化检讨会上指出:“我们当前的文化正在被绞杀,我们要把文化从严酷的灾难中救出来,我们要把绞扼文化的黑手击退,文化才有发展的前途……谈起文艺,文艺死了,谈起科学,科学死了,谈起教育,教育死了,谈起出版事业,出版事业也奄奄一息了。今日中国文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不民主,一

^①《1946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对国共两党命运如何分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1年3月25日。

切文化都没有前途,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用文化来做推进政治运动的工具,要把政治局面打开之后,新文化运动才有发展,否则生存都不可能,还有什么发展呢?”^①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出版难》

《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2期发表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采用“山西快板书”形式撰写的《出版难》,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业的一片萧条景象:

说出版,话出版,说起出版实在难。……成本天天高,读者日少。不是读者少,为是生活高。又怕生活高,又愁好书少,好书为啥少?一是作家生活不安定,没有心绪写好稿。二是通货膨胀发大钞,搅得造货成本高。三是“出版完全自由”了,太多书刊犯禁条,红裤子,多情郎,黄色读物奉令销。冯玉奇,笑呵呵,张恨水也卖勿过,茅

^①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第139页。

盾巴金更差得多！你要向前进，他要往后拖。文化运动三十年，文化水准只看低。往后拖，不算奇，拖倒了（还要）践死你，苛捐杂税样样有，工商贷款你既份。邮费涨，书价高，出版新书既人要，既人要，我弗关，这种生意谁教你干，（到如今）吃苦受难你活该！^①

在当时上海等国民党统治区内，不仅仅是“出版难”，甚至“抗战以后直到现在（1947年），青年们阅读进步书报还是有罪的。在学校、机关、部队、工厂，在特务势力统制所及的机构里，青年因偷阅书报而被警告，被告发，被申斥，被禁闭，被开除，被殴打，被送往集中营里受苦，乃是习见不怪的事。色情的，神怪的，荒唐的读物可以读，正当的书报被禁止，怕的青年们一旦睁开眼来看世界”。^②

为此，从1946年5月开始，在思想文化战线，国共两党以上海为主要阵地也开展了十分激烈的争夺战。9月14日，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指示华中解放区尽快派人去上海等地办报刊，同时要求“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要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的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③

《读书与出版》正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对报刊“先出版后登记”管理的空隙，先行出版，后办登记手续。笔者发现，从1946年4月复刊开始一直

①编者按：全书引用部分，对于遣词造句与今不同之处，以保留原文为原则。

②光未然：《蒋介石绞杀新闻出版事业的真相》，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华书局，1956年，第99页。

③袁亮：《周恩来关心新闻出版工作纪实》，《人民日报》2001年4月28日。